

闽台王爷信仰源流考

徐义强



“王爷信仰”是闽南和台湾最为独特的习俗。王爷信仰在闽、台地区十分普遍，并且在民间信仰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。在台湾，设庙祀神最多的是福德正神，即土地公，居第二位的就是“王爷”。王爷是地方性、乡土性的神，通过探求王爷信仰的源流，可以看出闽台文化和民间信仰双向互动交流的图景，王爷信仰的传播与反向传播的互动，彰显出了闽台文化同源一体的关系。

王爷与郑成功的关系

闽台民间十分流行的王爷信仰，学者认为与郑成功有关。台湾学者连横认为王爷是台湾民众对郑成功的崇祀，因在清朝高压政策下不敢公开祭祀，故仿花蕊夫人假借梓潼以祀故君之法，暗中祭祀郑成功。连横《台湾通史》中说道：呜乎！是果何神，而令台人之崇祀至于此极耶？顾吾闻之故老，延于郡王入台后，辟土田，兴教养，存明朔，抗满人，精忠大义，震曜古今。及亡，民间建庙从祀，而时已归清，语多避忌，故闪烁其辞，而以“王爷”称，比如花蕊夫人之祀其

故君，而假为梓潼之神也。亡国之痛，可以见矣！其言代天巡狩者，以明室既灭，而王开府东都，礼乐征伐，代行天子之事，故王爷之庙，皆曰“代天府”，而尊之为“大人”，为“千岁”，未敢昌言也。

台湾蔡相辉先生在《台湾的王爷与妈祖》一书中说道：“可知明郑时代台湾王爷祀之概略情形，即民间或政府基于崇功报德之心理，于郑成功逝

世后建庙祀之，其庙称将军庙。至郑经逝世后，郑克塽拜表请谥成功为武王、经为文王，两王合葬，合祀两人之庙，遂称二王庙……不旋踵郑克塽逝世，因克塽生前未袭王爵，而民间均欲称其为太子，故其庙称为太子庙，合祀成功祖孙三人之庙，则称大人庙或三老爷庙……而三位老爷之脸色，深褐色者为郑成功，赤红色者为郑经，白色者为郑克塽，亦符合三人生前活动背景。”台湾所祀王爷主要分别为池王爷、朱王爷、李王爷，神态各异。池王爷浓眉大眼，深棕肤色；朱王爷脸色红润；李王爷年轻英武。池朱王爷留有长须，李王爷则无，故而根据神像判断，池王爷乃郑成功化

身，朱王爷是郑经之化身，李王爷乃郑克塽化身。

有学者反对蔡相辉先生的看法，指出：作为瘟神崇拜的王爷信仰，在郑成功逝世以前就已经存在，这从有些王爷庙的庙志和台湾方志中可以找到证据。但此说影响不大。

郑成功收复并开发台湾，很得台湾民心，但他始终坚持抗清的立场，在清廷统一台湾后，百姓祭祀郑成功尚未得到官方认可，而明郑遗民起兵反抗清朝的事例也较多，清廷知道郑氏在台湾影响巨大，于康熙三十九年（1700年）下令将郑氏祖孙坟墓迁回原籍福建南安。台湾百姓无力阻挠此举，只有以隆重牲礼祭祀，并有多人驾小船随郑氏灵柩入海。其后，为缅怀郑氏乃造王船，设王爷像祭祀后送之人海，逐渐形成习俗。

官方与民间的互动：王爷的转变

王爷作为民间的神灵，在考察王爷演变过程中，必须要考虑官方权威与民间力量之间的互动。在此也可看到官方权威与民间力量的冲突与妥协。

康熙四十年以前，郑氏子孙三代陵墓俱在台湾，百姓不必专门建庙。郑氏坟迁回大陆，台湾人民纷纷建庙祭祀，王爷信仰在台湾以十分迅速的速度发展起来。对于台湾之民间信仰，清政府有相当程度之管制，如不符合政府祀典原则者，不易存在。郑成功坚持反清立场，民间祭祀有所顾忌。据介绍：清末，欧美和日本列强不断骚扰台湾沿海，清廷派福建船政

大臣沈葆楨到台湾处理外患之事。沈葆楨认为，承认台湾人民崇拜郑成功的合法性，有利于鼓励台湾抗击侵略。同治十三年（1874年）沈上书清廷，要求准予建祠，并予追谥。光绪元年（1875年）朝廷准奏，敕建郑成功专祠，并列为官方祭典，封为“平郡王”，追谥“忠节”。

那么，在此之前，碍于清廷高压，民间祭祀不能公开，有些庙甚至不能生存，而民间对郑成功的祭祀活动又不肯中断，于是有所变通。

一是“郑”改为“池”。因闽南泉州府之腔调，“郑”与“池”两字音同而韵异，“池”为“郑”之假借。如将池王爷三字连念，音韵与郑王爷三字相似，但其他州府人士却无法体会此一奥妙，更可轻易欺骗不懂闽南语的清吏。

二是“送王船”习俗，民间闪烁其辞，加以附会，而称“送瘟神”。台湾地处亚热带，炎热潮湿，被称为“瘴疫之区”，人们对瘟疫神相当敬畏，水旱必祈，灾疾常祷。福州瘟神五帝传入台湾，台湾民间也盛行“送瘟”仪式。据台湾学者刘枝万先生的研究：“瘟神之祭典，号称王醮，在台湾平常为三年、五年或二十年举行一次。建醮之时，装饰帆船，载上王爷神像或其他器物，放流于海或予焚化，颇为盛行，号称‘送瘟’，众皆相信如此作法，将疫疠带往他方，人民可免遭殃。在澎湖，将船焚化，谓之‘游天河’；送出海上，谓之‘游地河’。”乾隆十七年（1752年）王必昌《台湾县志》



王爷出巡



烧王船

也记载：“每三年大敛财，延道流，设王醮二三昼夜，谓之送瘟。”

“送王船”通过附会于“送瘟”得以延续，但却导致这段历史扑朔迷离，“王爷信仰”与“瘟神信仰”日益混为一体，二者相互混杂后，王爷神之数目和姓氏愈来愈多，更加使后人不知究竟。

三是送王船习俗在康熙五十年前后有另一转变，即由造真船真具送至海，改为以竹制船物在海滨焚烧。考其中原因，应是此时清朝实施“海禁”政策之缘故。此时汉人抗清势力在闽海十分活跃，清廷对海面实行管制，故而台湾百姓无法私自驾船出海，更无法像往年一样送王爷船至海上再驾小舟返回，于是送王出海改为仅在海岸边焚烧，这在仪式上变得与福州驱瘟号称“出海”习俗颇相类似起来。这样，与前文所述“送王”附会于“送瘟”一事相联系起来，无论在称呼上还是仪式过程上，王爷与瘟神都高度相似了。

王爷历次转变是“官方—民间”二元对立背景之下相互调适的结果，

一方面，国家以强有力的力量控制民间信仰；另一方面，在官方力量不断亢进的同时，民间信仰凭借其强大的草根力量，以柔克刚，改头换面，得以生存下来。通过王爷转变之历程，我们得以一窥“官—民”社会关系互动的图景：即面对官方力量，民间往往采取妥协态度，伴随而来的是官方也逐渐采取了默许态度，此过程总体呈现为温和的互动。

闽台文化的互动：王爷信仰的传播

王爷信仰在闽台经历传播与反向传播的过程，留下闽台互动的文化痕迹。

大陆学者郭志超先生《闽台王爷信仰与郑成功的关系》一文认为：“王爷从台湾传至闽南后，经发展变化，再从闽南向台湾逆向传播，最早王爷庙建于台南即是一个明证。”

台湾王爷总庙“南鲲鯓代天府”，是台湾最古老的王爷庙，建于康熙元年（1662年），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。当时不叫王爷庙，而叫郑成功祠；郑氏归清后，民间隐讳其辞，成为王

爷庙。之后王爷传入闽南,在闽南再次发生了变异,王爷数量增加了,如惠安的金王爷、同安的苏王爷、泉州的萧王爷等。

另外,清朝以及民国时期,闽南厦门泉州的不少王船,随波漂至台湾沿海,接到王船的当地居民奉王船上岸,捐款建庙加以祭祀。今日台湾王爷庙分布,虽是遍及各地,但其疏密度显然不同,以澎湖诸岛和台南沿海一带最为稠密,嘉义、云林、高雄沿海一带次之,往彰化、台中、屏东渐稀;台北、宜兰、台东最少,南投极微,花莲无。这就意味着澎湖群岛及台南沿海开发较早,而且是闽南的民间信仰与习俗浸润最深之地方。王爷信仰在台湾沿海多于内陆之迹象,乃与送王船之特殊习俗有关,沿海王船得以漂到之处,建庙宇之机会也最多。而南投等内陆县只有向他庙割香,才有建庙之机会。

这些发展演变可以看出闽台文化和民间信仰上双向互动交流的图景,王爷信仰是闽台神缘文化的一条不宜忽略的纽带,王爷信仰的传播与反向传播的互动彰显出闽台文化同源一体的关系。

闽台民间信仰特征与王爷信仰的嬗变

闽台民间信仰众多,王爷信仰背后是一个十分巨大而又丰富的民间信仰体系,这是王爷信仰最强大而广泛的根基。民间信仰与宗教信仰有以下差别:不完整的体系,不具有支配信仰的权威,不具有严密的信仰组织,

也没有自觉的信仰意识。在闽台民间信仰中,是泛灵信仰与多种信仰的相互叠加。在这里,儒道释诸神可以在同一庙宇被供奉,许多人上午拜孔子,下午拜王爷,晚上可能去拜观音,内心并不觉得有什么矛盾。

王爷信仰内容复杂,迁嬗之迹亦涉多歧。究其起源,王爷信仰与“送王”习俗是以纪念郑成功始,此乃是民间对一代伟人的朴素的崇敬心理,这可算王爷信仰的雏形阶段。究其发展,是一个历史演进的产物,也是闽台文化互动的产物。由于政治因素,有部分祭祀郑成功的庙宇假托“瘟神”而与中国自古就有的“祭瘟神”联系起来而得以保存下来。这是王爷的发展阶段。随着时间推移,对郑成功纪念的热情有所减弱,最终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。而“瘟疫”的发生也相应减少,与此同时,传统的送瘟神仪式也在消减之中。

民间信仰有着极强的融合性和功利性,神灵也往往按照民众的需要被创造出来。王爷信仰原初单纯的崇敬之情已经褪变在跪拜之间。如今当全身“珠光宝气”的王爷船巡游全村时,船所行处,皆燃放鞭炮,热闹无比,在浩浩荡荡送王船队伍中,人们争先恐后用手触摸王船,据说可以带来好的福气。今日之王爷,已经与土地公、观音等一道成为人们祈求官、安居乐业的福神。王爷保一方平安,增一方福气,为地方趋吉避凶、禳灾植福,而成为能起佑护作用的“万能之神”。

(作者单位: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)